

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 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

岳圣淞

内容提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以表达诉求、引导舆论、塑造规范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话语融入国际公共话语体系的能力体现。场域理论认为，行为体在社会化互动中的权力时刻受到所属场域的制约。国际社会话语场域是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场所，场域规则、话语惯习、话语资本及国家在场域中的关系位置共同决定了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格局。现有国际话语场域中存在着严重的西方霸权，在中国场域地位跃升、资本增加、话语权竞争优势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西方场域主导者试图操控场域规则进行霸权护持，导致中国的结构性压力上升，话语权提升面临瓶颈。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开辟新的话语场域，通过重构场域规则和关系网络掌握主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语的权力效能。“亚洲文明对话”作为场域创设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等级制的关系架构，营造平等有利的舆论和制度语境，为中国话语提供合法性和道义支撑；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的场域规则，提升议题引领和惯习塑造能力，发挥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本优势，促进形成对中国话语的准确阐释与解读，从而实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提升。

关键词：场域理论 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交 文明对话

作者简介：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感谢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当代亚太》杂志社约请的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124~155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开启了国际关系史上制度化解决争端的时代，也让世界意识到“言辞的威力有时胜过枪炮”^①——话语沟通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消解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战略疑虑；国际准则通过将国家间的战略承诺与共识制度化和文本化以形成强大的观念性约束力量，从根本上降低了冲突风险。时至今日，“话语权”已然成为国际政治权力意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在反恐、减贫、难民、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争论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有关概念和标准的界定，已逐渐演变为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政治的理论演化中，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等学说引发广泛关注的背后也无不隐现着话语权的争夺。^②

尽管如此，学界迄今依旧对话语权的学理地位和实践意义缺乏准确评估。在科学行为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背景下，针对权力的社会性和非物质形态的探讨始终处于边缘化境地。^③场域理论的应用有望打破这一局面。作为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其对权力多元化形态的认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倾向，使之在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中能恰当的融合理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想，在不同理论范式的对话中实现对权力本质的剖析。^④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既往研究展开回顾，归纳出引发国家行为体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困境及原因；第二部分以场域理论为基础，搭建一个检视国际话语权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回顾二战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演化的历史及中国的参与进程，指出中国在现有场域中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困境；第四部分以“文明对话”的场域构建为例，探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最后为结语。

① Sebastian Schmidt, “To Order the Minds of Scholars: The Discours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2011, p. 601.

② 方正：《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研究述评》，载《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9期，第51~58页。

③ Jean Bethke Elshtain, *New Wine and Old Bottl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thical Discours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8, pp. 11-19.

④ Sourabh Singh, “Appreciating Field Theory’s Insights into Politics: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Using the Case of Emergency in Ind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45, No 2, 2016, pp. 107-122.

一、国际话语权：既往研究与现实困境

“话语权”（Discourse Power）概念最初源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论”。^① 福柯指出，一切权力的本质是话语，权力是政治统治实现的前提，因此“话语即权力”。^② 在 20 世纪中后期席卷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大潮中，话语权的内涵在不同学科的专业语境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延展。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出“国际话语权”概念，将其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以表达利益诉求、塑造国际舆论、确立国际标准为目的，将蕴含特定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话语整合进国际公共话语体系的根本手段和能力体现，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集合体。^③ 既往研究在加深对国际话语权的内涵理解、探索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方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囿于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权力观，主流研究忽视了非物质性权力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形成基础和演化机制的认知具有片面性。

（一）既往研究

实证主义历来强调权力的物质性和行为体的客观理性，认为语言仅是传递行为体意图或代为施加权力的工具，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不具有权力意

^① 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的“话语权”概念的英文表述主要有两种，即 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 和 Discursive Power。笔者认为，这两种概念表述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对“话语权”中“话语”意涵的界定。Discursive 更强调话语的语言学意义，强调话语的文本形式；而 Discourse 则更贴近福柯的理论观点中对话语的定位，即认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② Michael Blain, “Fighting Word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Hitler’s Hyperbole”,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1, No 2, 1988, p 257.

^③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定义和内涵界定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但在几个核心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第一，国际话语权的主体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各主权国家，也包括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第二，国际话语权具有双重内涵，即“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的统一。前者具有动态性，与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自身实力变化因素相关；后者具有制度性和强制性，主要与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身份相关。作为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一员，每个主权国家原则上都享有平等的对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第三，国际话语权涵盖领域广泛，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安全等。第四，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功用包括获取物质性权力、维护国家利益、提升特定国家自身的软实力以及维护国家的形象等。

涵。尽管实证主义有限认可话语沟通的意义，但认为话语权即使存在，其作用也是附属和次要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认为前者能够发挥结构的强制规约性影响他国的决策方向，而后者则可以令他国在沟通之中改变意愿去做本不愿做的事。^①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对“谈判中的话语权力”有过论述，认为话语起到了协调各方意见、弥合分歧的作用，但前提是话语必须具有“物质权力的背书”，利用强迫和威胁性话语在谈判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预期目标。^②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话语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物质权力所不具备的功能，以非威慑方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方向：在发生利益纠纷时，话语施动者通过主动提供新的信息，鼓励其他行为体重新计算成本和收益，实现在特定问题上的合作。^③ 尽管如此，大多数实证主义者仍认为话语不过是“廉价言辞”，既不可信也不足以对行为体行为构成实质影响。“软权力”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趋向。“软权力”赋予诸如价值观、文化、制度影响力等观念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以主体地位，使之成为与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为代表的“硬权力”对应的权力类型。话语权被认为是“软权力工具”（Soft Power Toolkit）的重要组成部分，令话语具有了真实的权力意涵。^④ 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软权力的核心是“规劝”（dissuasion），无论是阐释观念价值、宣传制度优越性，还是塑造国际舆论和规范，都离不开语言。^⑤

在后实证主义话语研究中，除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外，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为代表的中观理论，分别从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塑造、语言

^①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谢耿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3页。

^②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③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5.

^④ 软权力理论归纳出了七种软权力工具，包括文化吸引力、价值观吸引力、外交政策正当性、国家间关系亲和力、发展模式吸引力、对国际制度规范的塑造能力，以及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力。

^⑤ Joseph S. Nye, “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3, 2016, pp. 44-47.

与文化的互构以及语言动力学角度，论证了话语作为社会性权力的功能与作用机制，奠定了后实证主义话语权的基本观点，即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基础，所谓客观实际上是经过话语赋值后在主体观念中被承认的意义结构，话语才是权力的根本形态。^① 在国际政治中，话语将主观认知与现实中的特定指涉相连接，通过建立完整的政治叙事实现对国际关系的定义。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据此将国家行为体话语权的行使归纳为观念表达、身份塑造和规则建构三个方面——观念表达体现为对事实的判断，即明确以何种方式定义及应对事态；身份塑造旨在定义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关系，是对行为体间共存与互动模式的选择；规则建构通过赋予行为体特定行为以合法性，实现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的确立。^② 尽管后实证主义并不否认权力的多重形态，但认为一切权力形式只有最终转化为特定话语才能兑现效能。后实证主义以相当激进的方式向传统语言观发起挑战，成功掀起了以“语言转向”为标志的范式革命，但也出现了反实在论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对此，艾伦·芬莱森（Alan Finlayson）指出，“围绕话语权力的争论暴露出当前理论范式的缺陷，保守派对语言漫不经心，而后现代理论又显得矫枉过正，唯有开辟一条中间道路，才可能为话语的权力本质提供一种兼具社会和科学性的解释”。^③

此外，不同国家结合自身实际，就国际话语权问题展开了大量案例和对策研究。国内学界对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关注始于 21 世纪初，涉及对中国国际话语权水平的评估，对中国对外宣传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对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体系对接与融合方式，以及话语权提升影响因素和现实路径的研究等。^④ 其中，有关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的研究占据主流，可以进一步分为对舆论性和制度性两种话语权的探讨。舆论性话语权指国家在国际场合对特定问题做出评价、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也包含为维护自身国际形

^① Cynthia Hardy and Steve Maguire, “Organizing Risk: Discourse, Power and ‘Riskifi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41, No 1, 2016, p 80.

^② Vivien A. Schmidt, “Does Discourse Matter in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Adjus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2, pp. 168-180.

^③ Alan Finlayson and James Martin, “‘It ain’t What You Say...’: British Politic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Speech and Rhetoric”, *British Politics*, Vol 3, No 4, 2008, pp. 445-464.

^④ 赵长峰、吕军：《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53~161 页。

象而采取解释和辩护的话语权利。^①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渗透论”和“中国不负责任论”等负面话语层出不穷，反映出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情绪和消极认知。如何在新形势下避免自身正当话语权益受到西方霸权的钳制，通过舆论性话语权主动阐释中国的战略动机、驳斥带有主观偏见的言论、维护中国的对外形象是此类研究的核心议题。^②制度性话语权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的确立国际议程，引导和塑造国际标准、规则和机制的权力。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出于维护自身不断延伸的国家利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亟待提升改善国际制度环境的能力。此类研究以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前提，结合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国际事务的经验，分析了中国运用制度性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基于不同领域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方式。^③总体来看，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时效性和政策导向性明显；除部分研究涉及对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话语权建设经验教训的回顾外，大部分研究缺乏基本视角的转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研究的学理基础不够全面，往往以社会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为切入点，偏离了国际话语权所处的国际政治理论语境，混淆了“国际话语权”与“政治宣传”“政策话语”“舆情分析”或“舆论引导”等概念的区别，对话语权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

（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困境及原因

自二战结束到两极格局的解体，再到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

^① 赵柯、左凤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载《对外传播》2014年第12期，第47~49页。

^② 有关舆论性话语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10页；郭道久：《增强中国政党理论国际话语权研究》，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59~65页；刘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误区因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第74~90页。

^③ 有关制度性话语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苏杭：《命运共同体、国际公共产品与制度性话语权提升——以中美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角色论争为例》，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7年第2期，第113~126页；谢晓光、李彦东：《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他者”语境》，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46~50页；王宏仁：《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8~153页；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第62~70页；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第43~47页。

卷全球的当下，国际体系已然发生重大变化，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随着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影响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争取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议程和规则制定、摆脱单边主义霸权话语的意义，开始积极探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途径。然而，当今国际话语权的分配依旧呈现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把持着国际话语权高地，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①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国际话语权分配的长期失衡？学界试图从霸权护持、国家的能力意愿和话语权内生因素三个方面探寻原因。

首先，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护持是影响国际话语权演进的首要原因。在无政府状态下，强国通过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事实上的领导作用而自动获得话语权优势，并通过权力垄断和滥用等不受约束的非公正手段扩大自身与其他国家间的权力差距。^② 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美国视国际话语权为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是比肩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战略资源。^③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塑造能力显著增强，令美国深陷霸权衰落的忧虑。为此，美国开始试图干预国际话语权的转移进程——不断发动国际舆论战，对潜在威胁对象实施“话语打击”，通过“污名化”（stigmatization）和“安全化”（securitization）等战略扭曲其国际形象、降低其国际声誉和公信力；^④ 提升国际社会对潜在威胁对象国际行为的威胁感知、强行赋予其与主流对立的非正义身份；同时推进排他性国际制度体系的形成，在巩固现有制度合法性的

^① Julie White, "Discourse, Power, Resista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Vol 11, No 2, 2011, pp 1-2.

^② Hung-Jen Wang, "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3, 2015, pp 172-189.

^③ 潘亚玲：《论美国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护持战略》，载《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53～164页。

^④ “安全化”的概念最早由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代表人物包括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和迪·怀尔德等。该学派提出“安全即言语行为”的论断，认为当安全施动者基于主观认知，将某个问题说成是安全问题，就是“安全化”的过程。有关“安全化”的定义、理论框架和案例分析，参见袁莎：《“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139～156页；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4～34页；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74～97页。

同时，针对竞争性新制度构建“去合法化”叙事以突显自身制度优越性，试图延缓自身制度话语权的进一步流失。^①

其次，国家个体能力与意愿的差异也是影响国际话语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实力水平是国家影响国际体系能力的客观限制，主观意愿则决定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范围和力度。^②处于不同实力分层的国家对参与体系互动具有不同的收益预期，因此，对国际话语权份额的需求能直观反映出其实际意愿。国际体系中要求对国际事务有更多发言权的往往是实力接近霸权国的大国、实力较弱的小国、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对现有体系的权力结构不满、希望在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中获得更大利益。^③相比之下，部分国家满足于自身实力现状，对参与体系互动的意愿有限，对国际话语权需求较低，甚至视其为一种负担。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国家会选择让渡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加入强国主导的权力集团参与集体决策以缓解自身履行国际义务的压力、规避风险。现实中，这种倾向表现为西方国家通过集国际话语权份额组成超国家规模的话语权实体，在涉及自身利益的特定国际事务中借助美国主导的政策联盟行使集体否决权，以此对抗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或改革议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缓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出现所谓的“西方缺失”，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提升空间的严重挤压。^④

最后，话语权内生因素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其中，话语质量代表了话语本身对行为体真实意图的还原水平，话语的基本形态、话语与行为体身份的匹配度都会对话语权力功能的发挥造成客观影响；传播效力是行为体调动话语资源、开展舆论疏导、实施宣传战略能力的体现，是影响话语权的主观话语因素；话语兼容度决定了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将主观意志以特定话语形式输出，以实现观念共享、认同和内化，体现了公共话语体系对个体话语产品的

^① Matthew C. Gertke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in Swift's 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sions", *The Explicator*, Vol 73, No 4, 2015, pp 243-247.

^② Giulio Napolitano, "The Two Ways of Global Governa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Multilateralism versus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Vol 9, No 2, 2011, pp 311-312.

^③ John G.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7-23.

^④ Rich Wilson and Roberta Herzberg, "Negative Decision Powers and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Experiments on Blocking Coalition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87, p 593.

认可水平，是影响话语权的主体间性因素。^①此外，话语权的流散和抽象特征也令其难以通过常态的权力认知手段被发现和掌握，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分布使话语权的形态和要素组成趋于多元，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掌握的话语权份额不尽相同，影响不同领域话语权的因素千差万别。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国家意识到自身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却也束手无策，难以精准施策加以提升。^②

此外，本文认为，还应关注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方面——话语互动模式对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为确保交流过程的规范和结果的可预期性，自发确立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对话语互动加以限制。尽管从未被正式申明，这些仅存于观念中的行为准则却能被长期遵循并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群体性默契并非经过刻意培养，而是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互动中被不同行为体所接受。^③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将这种具有主观模式设定、不存在物质形态的互动环境定义为“场域”。^④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具有场域属性，其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也时刻受到所属场域规则的制约，话语权亦不例外，其价值只有在特定规则覆盖的场域环境中才能得以兑现。^⑤国际社会的话语场域是供不同国家进行话语互动的平台，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并维系至今。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围绕“西方中心”确立的场域结构早已固化、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理念被深植于场域规则中，造成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话语行为的不公正评判，其话语权价值也因而被严重低估。^⑥从这一角度看，场域局限也是制约部分国家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因素，应在研究中予以关注。

^① Andrea Mayr, *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pp. 17-29.

^② 郑华：《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第56~62页。

^③ Ruth W. Grant and Robert O. Keohane,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2005, p. 30.

^④ Dan Hara, “Capitalism and Cultu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merican Studies*, Vol 45, No 1, 2000, p. 43.

^⑤ Didier Bigo, “Pierre Bourdi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of Practices, Practices of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5, No 3, 2011, pp. 225-258.

^⑥ 王金强：《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读〈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7~160页。

二、场域理论与国际话语权的场域逻辑

“场域”概念源自 19 世纪中叶的物理学，用于描述一种无形的空间范畴，在其中，具有一定特性的物质能对与之不相接触的同类物质施加一种力，如磁场和引力场等。20 世纪 30 年代，以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率先将场域理论引入社会心理学研究，提出社会环境与行为体观念相互影响的“心理场域”模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场域理论“社会学化”的集大成者。^①他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中汲取灵感，从场域视角审视社会实践行为，为场域理论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一）解读场域：关系、惯习与资本

社会实践理论认为，行为体与社会结构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以场域为媒介实现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的沟通关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场域实践，关系、惯习与资本是场域的核心要素——关系造就场域，惯习指导实践，资本提供动力。

关系（relativity）在场域中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场域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场域自身存在的方式。社会中包含着各种客观关系，布迪厄称之为“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②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在场域中形成若干固定的位置，“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分配中实际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③此外，不同场域以特定关系形式在社会体系

^① 严格来说，“场域理论”这一名称并非布迪厄首创，最初也并非指代其个人学术观点。布迪厄对场域的观点都被完整涵盖在社会实践理论之中，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其国际学术影响逐渐上升之际，学界才开始频繁采用“场域理论”指称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有关场域部分的论述。

^②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载《理论探讨》2008 年第 6 期，第 57～60 页。

^③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134 页。

中存在，通过融合、叠加、竞争、排斥等多种方式加强自身的合法性。^① 社会的高度分化使场域间关系拥有更大的延伸空间，不同场域在功能、范围和成员身份上的交集进一步促进了关系网络的连接，最终造就了复杂多维的社会环境。^② 理论上，不同场域或能通过平等竞争实现自然更替，或能通过调整各自的内部结构和秩序实现互补整合，共同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但现实中受到场域主导者观念、场域规则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场域间的恶性竞争持续不断，造成资源内耗、关系扭曲和体系结构的长期动荡。由此可见，场域既是支撑社会功能的基础工具，也是决定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

惯习 (habitus) 是对行为体场域行为逻辑的根本性概括。简言之，行为体在场域中的一切活动均是惯习行为。惯习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前理性、非推论的“实践感”，即在面对全新的实践任务时，行为体会不假思索地首先调用认知图式进行比对，筛选出最贴合当下情境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制定行动方案，整个过程类似于应激—反应模式下的自我感知，无须经过可行性论证。^③ 惯习的基础是场域规则，惯习的形成就是行为体对场域规则认知、习得、内化并实践的过程。场域在创设之初需要首先确立制度体系，包括对场域的基本性质、功能和目标的界定，场域参与者身份和资格的限制，场域内行为体位置关系的设置，场域互动的准则，场域资本价值的认定、资本与权力的兑换方式，以及各种保障性和奖惩机制等。^④ 这些规则既源于历史，也立足现实；既具有相对客观性，也须反映场域主导者的意志——在规则的确立过程中，场域主导者得以凭借先发优势将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融入规则中，也因而造成了场域规则天然的不平等性。场域“后来者”只能被动接受既定规则，无权对其公平性加以评判。遵循规则可以获取更多资本，实现场域内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违背规则则会面临惩罚，或降低地位、剥夺

① 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8~140 页。

② Kenneth Alla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Visualizing Social Worlds*,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2006, pp. 12-37.

③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2-65.

④ Chandra Mukerji, "The Cultural Power of Tacit Knowledge: Inarticulacy and Bourdieu's Habits",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Vol. 2, No. 3, 2014, pp. 348-375.

资本，或遭到排斥，削减权力。^①

资本（capital）是场域变化的原动力，是在特定场域中有效的权力资源，“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②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对于行为体来说，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场域互动消耗资本，同时也获得资本。场域互动的实质是不同类型资本的兑换与流通，行为体通过将自身占据的位置上的权力资源不断变换形式，使其成为价值更高的资本，提升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以争取更多资本交易机会，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③ 场域中的资本分为四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各种资本类型的基础，包含有形物化和符号化两种核心形式，^④ 具有支付、交换和衡量其他资本价值的尺度功能。社会资本是行为体在场域中特定位置上获得的网络关系资源，表现为与其他行为体间的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等。^⑤ 象征资本是行为体在场域中积累的客观评价、身份地位、声誉威望和信用水平等无形资产。虽然象征资本无法决定场域互动的最终结果，也不能为行为体带来直接的权力收益，却能在资本类型的转化中发挥加成效应，令掌握象征资本多的行为体能够在同等条件下更快或更多地获得资本。^⑥

文化资本是场域理论对资本本质独特认知的体现，是指能够对场域结构、规则和活动产生影响的文化资源，以具身化、客体化和制度化三种形式存在，代表着文化资本在场域中演化的三个阶段。^⑦ 具身文化资本是行为体在社会环境中主动吸收和在特定场域中被动接受的文化知识、技能和修养的

① Bernhard Wagner and Kenneth Mclaughlin, “Politicising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The Relevance of Pierre Bourdieu’s Habitus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ory & Psychology*, Vol 25, No 2, 2015, pp 202-221.

②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10 页。

③ Sebastian Schinder and Tobias Wille, “Change in and through Practice: Pierre Bourdieu, Vincent Pouliot,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7, No 2, 2015, pp 330-359.

④ 经济资本中的符号化形式主要指其他类型的资本能够在特定情况下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力。如语言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界定资源价值的功能，属于符号化的经济资本，布迪厄将其称之为“语言交换的经济”。

⑤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p 16.

⑥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第 289~308 页。

⑦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p 243.

总和；客体文化资本以具身化文化资本为基础，以公共文化产品形式在场域中流通，接受场域成员的消费和评价；制度文化资本是场域中文化资源的最高形式，它承载并代表着整个场域的审美气质、精神信仰和价值品味，是得到场域规则权威认可的文化资本。对文化资本的追求是场域互动的高级阶段，当行为体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试图将拥有的具身文化资本客观化、制度化，从而在精神层面实现对场域的主导。^①

（二）国际话语权的场域逻辑

场域理论认为，语言在交换中获得意义、产生利润，即话语权。交换过程类似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话语场域是语言交换的“市场”，交换行为受到类似“看不见的手”的场域规则的约束。行为体将自身话语输出到场域中，希望接收方能遵照其预设的路径解读意义并执行相应指令。话语交换的本质是共时竞争，只有少数话语能够成为主导话语并最终获得权力意涵。相较于广义上的社会话语场域，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由具备强大资本优势和主导国际体系意愿的国家主动建立。场域规则因融合了主导国的自身需求和价值判断而具有主观性，体现在对场域中国家身份和位置的设定、话语议题和内容选择，以及话语惯习的塑造等方面。获取身份和位置是进入话语场域互动并最终获取话语权的前提，国家所占据的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是客观匹配与主观选择的结果。国家具有多重身份，部分身份会被其带入话语场域而得到延续，如“发展中国家”“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太平洋岛国”或“英联邦国家”等。这些身份标签以国家附带的各种资本为依据，从历史、经济、文化、地缘等不同角度凸显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功能和形象的独特性。在涉及特定领域的话语议题时，具备相应身份标签的国家会得到更多关注，如在对非援助议题上，“非洲国家最有发言权”；在国际原油定价问题上，“石油输出国更有发言权”；谈及减贫经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脱贫最快的国家最具发言权”——此类话语往往因当事国所具有的象征身份和切身经历的客观性而被赋予优先表达机会，但发言权并不等同于话语权，且其影响终究有限，具有较大局限性。

真正决定国家在常态话语场域互动中地位的，是场域规则对国家以“自

^① Derek Robbins, “The Origins, Early Development and Status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6, No 1, 2005, pp. 13-15.

我”和“他者”为界的划分。界定“我一他”关系的标准取决于主导国的需求和偏好，获得“自我”认同的国家能够以主导者身份享受场域带来的特权，如分享主导国自带权威属性的话语渠道，在话语竞争中占据影响力优势；参与话语惯习的塑造，持续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场域整体的话语观念，加强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地位；自主设定和引领议题、实施“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将原本只涉及个体安全、甚至完全不涉及安全因素的议题主观包装成关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关切，而对本应被纳入场域、但可能损害自身话语权威的安全议题强行施以无害化表达，以维护自身的话语利益。^①相反，被归为“他者”的国家在场域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具有基本的话语互动资格。由于被界定为“不受信任的”场域成员，这些国家的话语行为会因受到“自我”群体的排斥而不得不面对话语价值被长期低估的困境。尽管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不同国家可以采取多样化的话语战略实现场域位置的提升，但“我一他”关系的转变因需要经历主导者的认可且涉及场域规则的根本性调整而变得困难重重。

塑造话语惯习是推动场域中话语权生成的核心阶段。取得国际话语权的标志是特定国家在场域互动中输出的话语被系统而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场域主导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具备了以言行事、以言指事和以言取效的权力功能。话语惯习在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确立特定话语在场域中的权威，使其发挥示范效应，为场域成员在未来复杂多变的话语互动中持续提供制造和解读话语意义的行动纲领。任何话语意义都依赖于特定语境的产生，因此在场域中，建构公共语境是塑造话语惯习的关键。^②主动塑造话语惯习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场域规则的支持，因此主导国更具优势。塑造的路径往往是从历史角度出发，主导国结合自身的认知和经历提出一套完整包含其信仰、理论概念和象征物的宏大叙事，使其在场域互动中得以推行，直至成为公共语境。^③随着不同场域成员在新的话语互

^① 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 *Migrant Mobilization and Securitiza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 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Threat?*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1-17.

^② Meghan A. Burke, "Discursive Fault Lines: Reproducing White Habitus in a Racially Diverse Community", *Critical Sociology*, Vol. 38, No. 5, 2012, pp. 645-650.

^③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How Can Emerging Powers Speak? On Theorists, Native Informants and Quasi-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ours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5, pp. 637-653.

动中总能优先选择以公共语境作为筛选、解读和评价话语的权威参考，在建构自身话语时也会自觉迎合公共语境的需求，话语惯习得以形成。

语境对现实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冷战期间，舆论战成为两大阵营交锋的重要形式。即便面对同样的国际情势，国际社会也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其根源就在于叙事语境的对立。^①如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均将最终结果描述为自我阵营的胜利——美国提出是自己的威慑政策迫使苏联撤走了导弹，而苏联则提出是自己的果断决策才使古巴得以保全。^②尽管两种叙事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但为追求利己的话语效果，双方都选择运用语境对事实进行“框定”和“剪切”，只采信有利于维护自身行为合法性的事实依据，淡化甚至忽略其他事实片段，通过话语拼接最终呈现预期的情节。

国际话语权场域演化的最终阶段是资本化过程。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象征资本源于国家在不同国际场景中的话语实践经验，如国家在国际争端与冲突调解中扮演仲裁角色、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出具有启发性建议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话语地位与声望的提升。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国家的“话语命名”能力。为特定对象的命名旨在利用话语权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知识、使自身话语客观化，具体包括情势界定，如将特定国际局势宣布为“公共危机”以进行紧急状态下的动员；描述关系，如建立“伙伴关系”“联盟体系”或“利益共同体”；确立国家间交往的模式，如提出合作倡议、发展国际机制与建立国际组织等。^③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国家运用国际话语权将自身理念话语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促使不同国家在文化消费和品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观念诱导的过程。相较于单纯直白的宣教，文化产品形态多元且表现隐晦，更易实现观念的大规模传播与渗透。在这一领域，美国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能力领先于全球。通过将自身崇尚的价值观融入对“美国治下理想世界”图景的描绘，美国得以将富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如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英雄主义、独

^① Patrick Wilz, “‘Antimatters’: Recovering Discourses of Opposition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17, pp. 149-162.

^② Roger Hilsm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Struggle Over Polic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6, pp. 140-158.

^③ Richard H. Friman, *The Politics of Lever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me, Shame and San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pp. 121-145.

立精神、使命意识和自由价值往往被强烈渲染，与美国对自我国际形象和世界观的认知形成高度呼应。^① 借助特定资本形式的固化，话语权得以在场域中长久地发挥权力效能，即布迪厄所说的“把语言层面的象征权威，转换成社会认可的力量，同时强加一种不可违抗的社会共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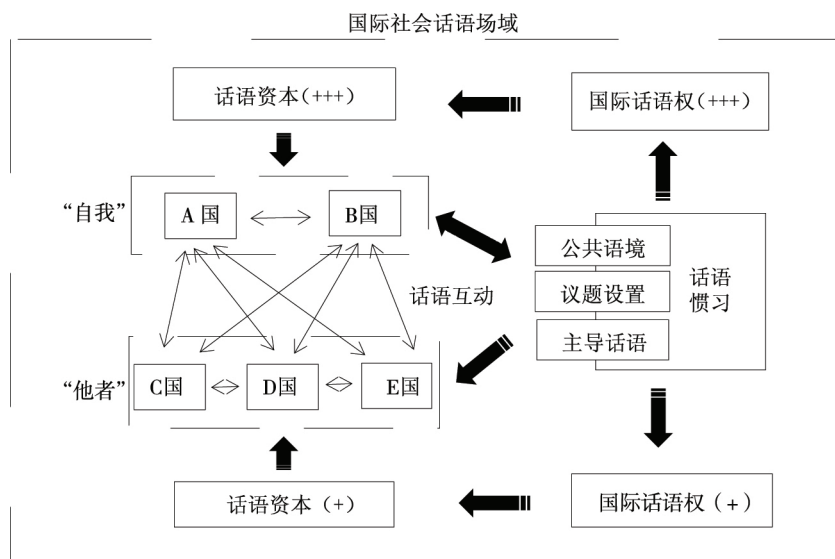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场域逻辑示意图

说明：“+”表示增幅相对较低，“+++”表示增幅相对较高；➡表示“自我”与“他者”国家阵营在场域中的话语权宏观循环，→表示单一国家行为体间的微观循环，二者同步进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实践

（一）战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

冷战背景下，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激烈碰撞。由于美苏双方均坚信

^① Peter Decherney, *Hollywood and the Culture Elite: How the Movies became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20.

^② 皮埃尔·布迪厄：《一种新资本》，宫留记译，载《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第75~79页。

自己才是唯一正义并终将取胜的一方，故各自投入大量话语资源极力建构自身合法化的话语体系，致使国际社会话语场域自诞生之初便被分裂成两个封闭且相互排斥的话语空间。美苏通过联盟方式与各自场域中的其他国家结成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关系网络，并以塑造公共语境和建立国际机制的方式持续巩固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霸权。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话语场域的公共语境被塑造为一则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和宿命论色彩的历史故事。其中，美国摆脱殖民身份和争取国家独立的经历被归因于人类本性中对自由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被视为西方公敌，防止其蔓延、不断扩大“自由世界”的范围成为西方共识。^①同时，美国投入大量资本展开全球布局，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凭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等区域安全架构搭建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友体系，并参与创设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些多边机制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话语场域提供了关键支撑。

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塑造的公共语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世界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阐述为基础，包含了对不同历史阶段有关战争与和平、世界经济危机、世界革命运动、国家的本质和国家间关系准则、国际政治格局、殖民地与民族自决等问题的丰富论述。这套论述的认识论被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遵循着某种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阶段之一，共产主义才是进化的终极形态。^②在制度层面，苏联奉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建立了促进阵营内部合作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和以制衡北约为目的的安全合作机制“华沙条约组织”。^③除了共同参与建立联合国外，美苏及其主导的两大阵营在国际交往中再鲜有交集，借助各自的话语场域展开隔空论辩反而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重要沟通方式。

在对峙的数十年间，除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发挥了有限的国际事务管理、国家间关系协调与争端解决作用外，两大话语场域都不约而同地将重点放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主导者，美苏两国一方面强化对内意识形态引导，

^① Patrick Wilz, “‘Antimatters’: Recovering Discourses of Opposition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 pp. 149-162.

^②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③ 左凤荣：《苏联丧失“话语权”的历史教训》，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第116~120页。

一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展开对外宣传，试图借助场域的外溢效应对对方阵营实施渗透瓦解。^①自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出现分化。苏联试图凭借自身在场域中的话语霸权地位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持续打压他国正当合理的话语权，对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进行公开指责、污蔑甚至报复，严重破坏了场域内部的话语生态。不仅如此，苏联还借“维护社会主义正统与纯洁性”之名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提出“社会主义集体利益高于个别国家利益”，肆意践踏他国主权，遭到阵营内国家的强烈抵制。^②至此，社会主义话语场域已沦为苏联加强霸权统治的工具。^③

至20世纪70年代初，东西方话语场域的功能效果和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通过对外输出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和大众消费主义成功帮助大多数西欧国家和日本摆脱了战后困局，实现了经济繁荣。^④相比之下，苏联自身的发展因经济结构封闭僵化和对外扩张造成的空前损耗而出现严重停滞，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也相继遭遇发展困境。面对巨大反差，“苏联模式”的吸引力日渐式微，而西方阵营却由此获得了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论据。在西方主动发起的话语攻势面前，信仰危机和不满情绪的持续发酵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话语场域的地位，进一步加速了其解体进程。冷战的结束令美国以战胜者的姿态宣布资本主义体系在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竞争中胜出，也使其话语资本和威望得到空前提升。^⑤国际社会进入了美国称霸的“单极时代”，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分裂局面就此终结。

（二）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话语场域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基于对自身实力水平和现实需求的清醒认识，中国将对外关系的根本目标定为维护新生政权、保卫

^① Ronald R. Krebs, “How Dominant Narratives Rise and Fall: Military Conflict, Politics, and the Cold War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4, 2015, pp 809-845.

^② 刘国普、莫岳云：《苏联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嬗变历程与教训探析》，载《理论月刊》2015年第3期，第184~188页。

^③ 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和苏联（1941~1991）》，王振西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1页。

^④ Daniel C. Thomas, “Human Rights Ideas,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7, No 2, 2005, pp 110-141.

^⑤ 雷勇：《民主化与“国家性”问题关系辨析——基于苏联解体的政治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02~109页。

国家安全、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持与认同，以及推动战后反帝反殖民运动四个方面。^① 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引下，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参与其话语场域互动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应对西方持续的话语压力。

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尚未对提升国际话语权展开系统性的战略谋划，但已开始重视国际舆论对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敌视的总体倾向，毛泽东曾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消极认知为例，生动阐述了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负面话语——首先是树立信仰自信，“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② 其次是辩证看待负面声音，正确区分批评和污蔑。对合理的批评要审慎吸收，对无端的指责要坚决回击，“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③ 再次是发挥集体力量，在协作中提升自身威望，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④ 最后是紧跟国际形势，善于利用其变化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论及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的紧张局势时，毛泽东指出，“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⑤ 这些论述中包含的核心思想为中国探索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至今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⑥

经过不断摸索，中国借助在多边场合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契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等对外关系理念，积累了重要的话语资本和场域互动经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美、英、

① 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6~1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7~88页。

⑤ 杨东、李宇轩：《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挨骂”的》，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第96~98页。

⑥ 同上，第101页。

法、中、苏)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与国际问题讨论的重要会议。^①期间,中国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在越南、柬埔寨与老挝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力地维护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形象。^②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中印和中缅联合公报中明确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1955年4月,中国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29国首脑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自主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基于维护广大亚非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共同利益,中国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求同存异”的重要理念,为会议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初期参与国际话语场域互动取得的重要话语成就,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⑤考虑到当时复杂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有限的实力水平,其意义更见重大。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中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场域的中坚力量。面对苏联日益显露的“社会帝国主义”倾向,中国认为苏联已事实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故而对其进行批判。此后,中苏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论战,也由此占据了整个60年代社会主义话语场域的核心议程。需要指出的是,中苏论战是致使两国关系最终破裂的直接因素,但它也客观促进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增进了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间的关系,奠定了中国的国际话语威信;它令中国获得了意识形态斗

① 宋晓芹:《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64~71页。

② Chen Jian,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Settlement of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in Mark Lawrence and Fredrik Logvall eds., *The First Vietnam War: Colonial Conflict and Cold War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0-262.

③ 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87~93页。

④ 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6页。

⑤ 袁正清、宋晓芹:《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国际规范扩散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66~81页。

争的宝贵经验，增强了自身的国际话语塑造和传播能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维护并践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标志着中国再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重返联合国拓展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空间，使其得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对中国的对外话语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成功跨越意识形态界限、与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展开对话，是中国真正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恰在同一时期，中国为应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而主动展开的对外战略调整顺应了这一需求——“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思想的提出，为团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扫清了障碍。^①在此背景下，整个70年代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交潮：截至1979年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遍布世界五大洲。^②逐步完善的对外关系网络令中国成功摆脱了因意识形态局限造成的国际身份缺憾，也极大延伸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战略自主空间，为中国话语的国际化进程积蓄了重要的社会资本。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话语场域实践的现实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见习期”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蛰伏期”。作为“后来者”，中国对场域规则、结构乃至整体话语环境的认识仍有待提高，加之受到“他者”身份定位和实力水平的限制，开展大规模国际话语战略布局的时机尚不成熟。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转向经济建设、对外实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国加快了结构性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在经济领域，中国于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于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在安全领域，中国于198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1990年正式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于1992年和1996年先后加入

^① “一条线”思想是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而“一大片”思想是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他说：“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参见彭远：《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第132~13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截至2019年3月，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78个。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①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国际话语实践主要在上述国际机制中完成，且多数情况下只在涉及自身利益或对参与结果具有较大把握时才会主动发声。^② 事实证明，中国主动接受国际规范并适度收缩话语空间的决策是明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国际身份转型期的考验，有效降低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认知的偏见。至 8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国际行为表现出的理性、负责和可预期趋向给予积极评价，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③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剧烈动荡的国际局势对尚处于国际体系“见习期”的中国再次形成冲击。面对西方“和平演变”力量持续上升的话语攻势，在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继续保持着低调谨慎的话语作风，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1992 年，邓小平在谈及中国发展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④ 中国在 21 世纪之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此后十余年间始终保持着超过 10% 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⑤ 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物质实力的显著提升使中国获得了国际公认的“经济大国”地位，但成为真正的“话语权大国”还需要中国主动采取战略规划，需要结合多年来参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互动的经验，将物质实力转化为话语资本，推动中国话语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国际利益、具备塑造国际规范的能力，并最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体系的发展产生有益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被纳入中国对外战略议程。自 2008 年起，“国际话语权”开始在中国

① 杨娜：《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8 期，第 39~49 页。

②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③ Tim Summers, “Power, Perception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US and EU Responses to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3, 2019, pp. 748-749.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 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46 页。

⑤ 李金华：《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评析》，载《开放论坛》2001 年第 2 期，第 8~10 页。

的官方话语中频频出现。2008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国际战略开始出现积极主动的势头转向。^①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② 这反映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思路是以促进外界对中国的准确认知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基于此，中国先后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话语。“和平发展”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对自身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的根本概括，“和谐世界”是中国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国际秩序观，二者相辅相成。“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出中国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的新认识，为塑造中国爱好和平、讲求正义、尊重秩序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③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客观上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机遇：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无法自拔之时，中国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果断实施率先消除了金融危机的主要负面影响。在保持自身经济稳定的同时，中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展开协作，有效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在亚洲的蔓延。在此期间，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多边平台主动提出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提出改革的内容和路径，为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④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实力之外的“权力潜能”，包括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

^① 《200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9-03/16/content_1260198.htm。

^②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教育部网站，2011年10月12日，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201110/12_5877.html。

^③ 《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7年9月1日，第4版。

^④ 管传靖、陈琪：《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35~61页。

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潜在领导力。^①通过此次危机应对，中国更坚定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信心，也从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依托于共有身份、在合作中实现。因此，应始终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促进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各领域、各层次上权威性和认可度的提高。第二，制度性话语权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主攻方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当前西方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缺陷。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理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获取与自身身份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势在必行。^②第三，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提升必须以雄厚的话语资本为前提。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危机场景并非常态，其对国家形象和威望的影响终究是暂时性的——不可否认，2008年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致力于维护的全球领导形象，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国际话语权地位。在2008年至2009年5月间的一系列密集表态中，奥巴马政府通过回顾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历次经济危机中美国的表现，强调了美国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和强大的领导能力；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受害者叙事”，指出美国与其他国家“同为此次危机的受害者”，淡化了“美国责任论”对自身造成的话语压力；最后通过提出联邦政府层面的一系列“堪比‘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实现了稳定公众情绪和重振市场信心的目标。^③由此看来，美国得以最终摆脱此次危机对自身国际声誉的负面影响，除了经济资本的支撑外，其多年来通过主导国际话语场域积累的话语资本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提升国际话语权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中国参与国际社会话语场域实践的战略性和目的性和系统性明显增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讲好中国故事”，通过构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体性叙事，有意识地塑造和维护自身积极正面的

^① David Knights and Darren McCab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Demystifying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No 2, 2015, p. 197.

^② 胡宗山：《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载《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第127~135页。

^③ Andrea A. Chua and Augustine Pang, “US Government Efforts to Repair Its Image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38, No 1, 2012, pp. 150-152.

国际形象。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①基于此,中国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作为自身发展的指导方针,在对外关系领域提出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方针,总体上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②这些理念话语的提出为国际社会以全方位立体化视角深入了解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提供了权威阐释与解读。

第二,积极参与与现有多边机制互动,通过提出创新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和制度倡议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安全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防范非传统安全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区域合作领域,中国主导创设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中拉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和“澜湄合作机制”等地区性合作框架,有效加强了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网络,为协商解决区域性问题的话语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倡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制,为完善现有治理格局、增强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在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发挥了引领作用;在促进全球均衡发展方面,中国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以促进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通过设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愿景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总体上,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权力观、利益观、秩序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革新带来了重要启示。

第三,注重国家软实力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促进国际话语权在话语资本积累中得到提升。2013年9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198页。

^②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第26~29页。

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① 这体现出中国已意识到话语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对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性支撑作用，因而在提升路径上更强调二者的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具有重要价值”，要把“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布局，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双边层面先后同美国、俄罗斯、英国、欧盟、法国、印尼、南非、德国、印度和日本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多边层面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东盟“10+1”和中非合作等现有机制，将人文交流纳入合作议题，拓展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在教育、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并通过旅游年、文化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图书展、体育赛事和智库对话等活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③ 在加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理念在更高层次上推广。2019年成功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弘扬亚洲和世界文明成果、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搭建了重要平台，显示出中国坚定维护和支持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的决心。

总体来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历经十余年的实践已初见成效，为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中国越发积极主动的话语场域实践也遭遇了更大的话语压力，与场域规则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首先，在西方中心主义和遗存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国的“他者化”身份定位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以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排斥为典型，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依旧具有强烈的主观偏见，以意识形态之名对中国强制施加“污名化”和“安全化”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公正客观判断。其次，西方话语惯习在现有场域中的定势效应明显，对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a.gov.cn/zxbd/nd/2013/document/1374228/1374228_1.html。

②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q/2013-08/20/content_2470777.html。

③ 张耀军、李晴：《人文交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跨越文化差异》，中外人文交流网，2019年4月17日，<https://www.ccipe.edu.cn/news/news-1642.html>。

中国制度性话语输出形成阻碍,使“中国威胁论”的滋生和蔓延成为可能。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国制度话语的进攻性解读极易产生误导,尤其对本就因中国崛起而怀有战略疑虑的国家更具煽动性。随着负面话语的持续传播,“中国威胁”很可能因此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话语“安全困境”的产生。^①最后,对中国话语资本价值的不公正认定造成了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不可持续性。近年来,“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引发持续震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兴趣,并主动展开探索和借鉴。^②这一现象引发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警觉,认为“北京共识”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将威胁并取代长期以来被普遍奉为国家发展模式范本的“华盛顿共识”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中国实现全球霸权的“软实力武器”。^③受此影响,西方话语中不断衍生出如“中国阴谋论”“债务陷阱论”“经济侵略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形式多样的、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合法性的解构话语,甚至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扭曲性解读,严重损害了中国话语赖以形成国际影响的资本价值。^④

四、“文明对话”场域构建：新时期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路径新探索

本文认为,鉴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困境,可考虑开辟新的话语场域,通过重构场域规则和关系网络掌握话语主动权,充分释放中国话语的权力效能。“亚洲文明对话”作为场域创设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冲突的场域规则,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议题引领和惯习塑造能力,营造平等有利的舆论和制度语境,为中国话语提供合法性和道义支撑;以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等级制的关系架构,以文明

^① 陈岳、丁章春:《国家话语权建构的双重面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9~22页。

^②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11页。

^③ 张剑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第10~14页。

^④ 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59页。

共识作为增进互信的基础，有利于发挥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本优势，推动形成对中国话语的准确阐释与解读，促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提升。

（一）规则重建：“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之辩

学界普遍认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对西方塑造国际秩序的观念和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将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承袭的文明间的冲突，并将伊斯兰文明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首要威胁。^①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文明间关系的判断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话言价值的衡量。受此影响，在现实的国际话语权博弈中，西方国家的“冲突思维”得以在对话语场域的规则建构中表现出来——通过排他性的身份设定和对公共语境的控制，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价值遭到持续压制。

相比之下，“文明对话”为重新审视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超越种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新视角，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共存、借鉴和融合中前进，而非建立在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之上。通过深度挖掘不同文明间的共通性，以对话消除误解、增进信任，进而加强国家间的文化、身份和利益认同，有利于促进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②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挑战更加突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③

在“文明对话”的话语场域中，基于平等而非对抗的价值导向，国家间关系并不存在人为划分的“自我”与“他者”的根本性对立，每个国家既是场域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因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力地位。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p. 17.

^② 马利哈·洛迪、钱珊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促进亚洲及世界和谐发展》，载《国际传播》2019年第3期，第1~2页。

^③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15/c_1210134568.htm。

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① 场域的共同语境并非由单一文明所主导，而是不同文明融合的成果，每个国家都是共同语境的塑造者，因而其话语价值都能得到公正的认定和应有的尊重。同时，以“对话”而非“竞争”作为场域互动的的基本模式，体现出文明对话场域的根本宗旨是凝聚共识而非零和博弈。在公平包容的话语生态中，每个国家的话语权提升都在促进着场域共识的达成，都在为“亚洲”在国际社会整体形象和话语权的提升做出贡献。

倡导“文明对话”场域的创设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为突破自身国际话语权提升瓶颈而采取的重要战略步骤。以“亚洲”这一地理概念限定场域的基本范围，反映出中国对自身实力水平、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理性判断。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亚洲始终是中国国际影响力辐射的核心区域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点，中国也始终以“亚洲国家”作为自我身份认知的前提。作为历史上“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曾长期凭借物质、精神和制度领域的文化输出保持了在亚洲的重要影响力，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天然纽带。“文明对话”场域的开辟为中国在历史认同感基础上提升自身的议题引领和话语号召力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关系重塑：伙伴关系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协同推进

对场域中的行为体来说，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行为体基于共同利益或身份认同选择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在特定情况下实现权力的整合叠加，在场域活动中争取主动。话语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具有相近或相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体通过共同发起、支持或反对特定议题，共同表达对特定问题的关切，共同质疑、批判甚至推翻特定话语等方式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现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西方主导下的场域规则本质上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要求场域中国家的关系分布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构建关系网络的行动空间。相比之下，文明对话场域摒弃了意识形态分野，赋予国家按照自身需求构建关系网络的自主权，有利于激发不同国家参与场域互动的积极性。

作为文明对话场域的倡导者，中国自主构建的关系网络不仅要服务于自身的话语需求，还应发挥协调场域各方关系、维护场域规则、确保场域互动平稳推进的枢纽作用。伙伴关系网络和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

^①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关系机制，可为文明对话场域提供强有力的关系架构支撑。^①截至2020年年初，中国与中亚、东亚和南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国家组织建立了近30对伙伴关系，亚洲区域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②在多边层面，中国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共同繁荣、持久和平、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国际政治秩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最终实现全人类福祉的提升。^③亚洲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强调亚洲国家在历史经历、文化背景和现实发展需求上的共通性，提出了建设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的愿景。作为一种实践路径的指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共有价值、共同利益和共享身份，同时包容不同价值取向、尊重不同利益诉求并寻求不同身份间平等共处的可能，为亚洲各国间以促进协作互信、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为目的展开话语互动提供了理念支撑。^④

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明对话场域中的协同推进使中国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国际话语空间，为塑造共同观念市场、更大限度发挥话语权力效能奠定了基础——中国提出的话语理念和制度倡议得以在亚洲话语场域范围内率先获得认同和实践，从而避免了陷入西方话语陷阱或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钳制；通过亚洲话语场域的优先传播渠道，中国话语能够以更快速度发

^① 肖晞、马程：《中国伙伴关系：内涵、布局与战略管理》，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72~88页。

^② 中国与亚洲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主要分布在四个不同层级上：与中国建立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亚洲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泰国；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塔吉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上包括土库曼斯坦、卡塔尔、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和东盟；在战略合作关系层级上包括菲律宾、文莱、阿拉伯国家联盟与马尔代夫。此外，中国还与新加坡建立了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与尼泊尔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和韩国建立了中日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有关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与现状，可参见笔者此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Shengsong Yue, “Towards a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Implications,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 2, 2019, pp. 5-27.

^③ 刘勇、王怀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载《探索》2019年第2期，第32~40页。

^④ Zhang Denghua,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sia &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 5, No 2, 2018, pp. 196-207.

挥示范效应，并通过伙伴关系的延伸实现跨越场域范围的传播，令中国摆脱了为迎合西方场域规则和话语惯习而被动采取的“削足适履”的话语战略。

(三) 语境重构：以中国文化阐释中国话语

“文明冲突”之所以能够在现有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成为主导，离不开以西方价值体系为评判标准的“文明优劣论”所提供的理论支撑。^① 语言深植于其所发源和兴盛的文明，而当文明被人为界定了优劣和高低，必然会对相应的话语价值产生消极影响。正确理解特定国家的话语内涵离不开对其文化语境的考察。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互动都深受“文明优劣论”的影响，导致中国话语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被置于西方的语境中加以审视、理解和评判，造成意义的严重扭曲，影响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提升效果。^②

如果将中国话语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就可以发现其清晰的传承脉络：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问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这是对中国传统“仁义”“以和为贵”，实现“天下大同”的思想的继承。^③ 在安全领域，中国基于共建共享原则，提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的目标，是对“王道”“尚德不尚武”等思想的继承，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追求兼济天下的王道，反对唯我独尊和唯利是图的霸道。^④ 在经济上，中国主张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的现实情况，坚持合作共赢、兼收并蓄，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持久繁荣；强调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持久繁荣的世界，是对“和谐共生”思想的继承。在文化上，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更加重视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传承，坚持各种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世界，这是对“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在生态环保领域，中国坚持提倡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继承，体现了中国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对人类共同利益

① 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4~44页。

② 黄华新、胡霞：《认知语境的建构性探讨》，载《现代外语》2004年8月第3期，第248页。

③ 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话语、实践与创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15页。

④ 马跃堃：《“和”文化与亚洲安全观》，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3期，第32页。

的新解读、对传统发展理念的全面超越。^①

然而，当中国话语被错置于西方的语境中进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独特的东方哲学思辨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和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西方传统权力观念下对中国战略走向的激进和片面解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国际倡议难以得到正确认知和有效推进，反而会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忧虑随着话语的持续扩散而加深，形成话语意义的恶性循环。文明对话场域的构建令中国通过重构文明语境、掌握对话语意义解释的主动权成为可能：只有在中国话语回归中国文化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对自我形象、发展理念和对外战略话语的再阐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五、结 语

二战结束后，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世界总体和平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话语交锋取代兵戎相见成为国家间实现战略目标、维护自身利益的新常态，和平时期的权力争夺从战场转向谈判桌，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权力实践形式越发得到重视。^② 国际社会话语场域通过对自身结构、形态和功能的调整不断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场域中的实践经历具有独特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外部环境和中国对外战略共同影响的结果：从被迫失语到试探发声，再到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各领域国际问题的商讨与解决；从被动跟随到主动融入，再到积极塑造国际社会话语场域的演化路径，在运用话语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中国开始试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建言献策。尽管如此，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其实力水平和国际地位尚不匹配，已成为掣肘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重要因素。场域理论为国际话语权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通过赋予话语权互动一以贯之的行为逻辑使之得以被具象化理解；从场域视角出发揭示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互动模式的弊端，有助于加深对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的认知、促进形成新的路径思索。

^① 王立平、王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载《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第191~192页。

^② Daniel Altman, "The Strategist's Curse: A Theory of False Optimism as a Curse",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2, 2015, pp 284-315.

it transitioned towards an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Thailand adopted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This resulted in the Thai government losing its control o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ial base at an early stage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industrial expansion was reliant on foreign companies and capital,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ailand to undergo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lled after it achieved middle-income status. A comparison of the ROK and Thailand offers important lessons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as they opt for export-oriented strategies. With respect to theory, this contributes to gaps in the literature on “East Asia’s experiences”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ics.

Key Words: Progressive Opening; Comprehensive Opening; Independent Industrial Expansion; Dependent Industrial Expans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bout the Author: Luo Yifu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Theory, Reality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a

Yue Shengsong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s a state’s capacity to incorporate it’s national values and cultural symbols into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narratives, with the objective of shaping the norms and public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is-à-vis its interests. Field theory argues that the power of actors engaged in social interactions is restri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nd i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is external environment can be thought of as prevailing narrativ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ules of the field, the customs of discourse, discursive capital, and the position of stat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llectively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Nowadays, the Western world still maintains hegemonic power in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international narratives are shaped. As China’s position together with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s enhanced, as its discursive capital increases, and as it broadens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a large extent, Western actors have attempted to control the rules of the fiel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heir hegemonic power.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growing levels of structural pressure on

China, which faces a bottleneck concerning the growth of its ow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China should consider creating a new field of discourse, where enables it proactively reconstruct the rules of the field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ereby asserting a robust and effective Chinese discourse power.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represents a constructive effort in this direction, and has therefore posed deep implications: as partnership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replac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qual and constructive sense of public opinion and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be built. In this way, China's narratives will relatively grow in terms of their legitimacy and moral authority. Besides,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will be realized as rules shaping conflict between civilizations are replaced by those which support learning between them, and as China leverages its unique advantages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capital to build its capacity to set the agenda and to model customary norms. This will promote accurate descrip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narratives.

Key Words: Field Theor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Chinese Diplomacy;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bout the Author: Yue Shengsong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